

想像的異邦，飄忽的照準

◎ 劉 樟

諸葛蔚東：《戰後日本輿論、學界與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二十世紀50年代後才隨著「中國」這個稱謂的定型而發展起來的「中國學」，像曾經於二次大戰以前和戰爭期間在日本社會存在過的「支那學」一樣，基本上仍然處於日本「國策研究」的延長線上。並且，就「以學術服務國家」的學術功利性而言，後者絲毫不遜前者（由竹內好、武田太淳等人於1934年創立的「中國文學研究會」迴避了「支那」而選擇了「中國」的說法，在當時是一個極其特殊的例外），這在某種意義上，類似於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現代化、現代性研究。這是筆者閱讀《戰後日本輿論、學界與中國》一書後得到的最大感受。

該書作者敏感而精心地選擇社會輿論為切入點，通過對不同時期的傳媒視角、有代表性的聲音及學者的研究個案進行分析，探討輿論與日本人的中國認識的形成背景，以具體事例描畫了一幅戰後日本知識人之中國觀的變遷曲線。

就像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的關注，特別是近二十年來對現代化理論的研究無時無刻不與國內的社會思想狀況息息相關一樣，我們也完全可以說：

日本學術界所從事的並非是單純的學術研究，學者們試圖通過對新中國的分析，探求出一條全新的社會變革道路。戰後日本的學者對中國研究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這自然與當時日本的社會思想狀況有開密切的關聯，這種社會基礎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戰後日本中國認識的形成。

這種日本社會的「中國認識」並不是一個線性發展的簡單過程，它不但融入了日本知識人對於近代日本的反省和批判，而且，日本國內的經濟發展狀況和世界局勢，特別是日美關係的影響幾乎在它的每一個階段都投下了很深的影子，甚至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了坐標的指向。

戰後初期，由於戰敗和美國的軍事佔領，日本國民普遍陷入失落感和文化自卑意識之中。

日本知識份子有一種通過對中國研究的解讀來表明自己社會變革的理想和方向的傾向……歸結起來，戰後一個時期內的中國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多是出於對於日本近代的批判。

充滿了對於中國式社會變革的憧憬。但是公平地看，即使後來沒有遭到學術界的清算，這一時期的中國問題研究也有「見樹不見林」之虞，這一方面是由於其所抱有的「日本為何戰敗，中國為何勝利」的問題意識過於強烈和功利；另一方面也由於冷戰初期中日官方、民間

交流之不暢，日本學者的「中國認識」很大程度上囿於中共的對外宣傳和對新中國人民昂揚、樂觀、向上的「整體印象」。典型者如貝塚茂樹在1954年10月，應邀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周年慶典後，寫下的對革命領袖毛澤東的印象：高大、莊重、樸素、坦誠——「好像電影中的人物」，令人想到詩人胡風在同一時期寫的詩——《時間開始了》。

從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出現的分裂，極大地動搖了日本知識份子曾擁有的社會變革理念。當時的社會輿論使不少知識份子開始從不同的角度來審視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是日本知識份子意識形態變化的一個先兆」。在對當時的社會輿論和中國問題專家研究的狀況進行了一番考察之後，作者指出：

與我國對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的研究相比，日本知識份子的研究是超前的，它們在50年代末期，就已指出了在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分歧，以往的許多定論和觀點也就此被推翻了。自然，這一現象與其受美國的中國學影響有著很大的關係。

如果說戰後初期，日本知識份子對美國學界基於某種警惕還保持著相當距離的話，那麼，到50年代末期以降，由於冷戰威脅的加劇，他們則開始逐漸認同美國的意識形態，日美知識界從觀念上日益接近。並且，伴隨著日本經濟的高速成長，尤其是「安保鬥爭」之後，日本學界迎來了一個意識形態色彩逐漸淡化的時代。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以竹內好為代表的、通過肯定中國的社會革命來批判日本的近代化的觀點遭到了清算，學界的主流思想又重新回到了日本成功地實現了近代化，中國依然落後的既有的認識論軌道上。不知是幸或不幸，60年代以後，中日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日益拉大，似乎也「驗證」了這種主流思想的「正確」，與此同時，中國社會無序論以及質疑中國能否實現現代化的不信任觀點隨之抬頭。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70年代初，中國對美、日謀求戰略接近之前。

1972年9月，中日建交；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化干戈為玉帛」的短暫蜜月終難掩蓋由於意識形態差異和經濟發展不平衡而造成的巨大鴻溝。隨著「文革」結束，原來深藏於中國社會暗處的一些極端封建性的東西，如等級觀念、血統論等開始曝光，中國政治經濟上存在的問題也日益浮現。大約也就是從這時起，一批對中國抱有截然不同的問題意識和明顯的叛逆精神的學者開始登上學術舞台，一種基於經濟建設的成功、帶有明顯功利色彩的「重新評價日本的近代化」的思潮開始在學界蔓延。

如果日本後來沒有遭遇一場貫穿整個90年代的「泡沫經濟」及其所帶來的長期停滯的話，進而言之，如果沒有發生在同一時期的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的話，那麼，這場對日本的近代化進行「重新評價」的社會思潮究竟會如何發展，把日本人的「中國認識」引向何方真的很難說。而在199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五周年時，由日本首相府主持的輿論調查結果顯示：在日本國民中，「對中國沒有親近感」的佔51%，「這一現象在戰後日本是從未出現過的」；而在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的2002年8月，由《讀賣新聞》社進行的調查表明：回答「中國不能信賴」的人數第一次超過了認為「中國可以信賴」的人數，持「中國的軍力有可能威脅日本的安全」觀點的人則達70%。

誠如作者所說：

戰後日本的中國認識始終是與日本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相關聯的，這也是戰後日本的中國認識不斷發生變化的原因，此外，由歷史原因所造成的中日關係的獨特性以及「雖近實遠」的中日間文化上的差異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

說穿了，存在於日本學界和輿論中的所謂「中國認識」，只是一種以自身的戰略目標為基軸、可隨時調整的對於中華民族和中國社會狀況的預設而已。雖然有時不乏「驚人」的發現，有時則充滿精緻、翔實的數據，但基本的前提更多地是基於一種對於異邦的想像，其目的則是為了替自身的戰略目標尋找參照，核實的照準。然而，遺憾的是，這個被想像的異邦時而災難深重、命途多舛，時而高歌猛進、勢如破竹，雲裏霧裏，有時連自己都摸不著頭腦，其作為「坐標」、「參照物」之靠不住便可想而知了。

「為了更好地理解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認識，也就有必要把歷史上的中國觀與其中國的研究放在前面加以探討。」作者正是通過這種對日本學界和輿論界「中國認識」的爬梳，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反省和思考歷史，特別是更加深刻地認識日本和日本人的絕好視角。

但是，應該指出的是，本書雖名為《戰後日本輿論、學界與中國》，但作者的考察重心實際上還是放在「學界」上，對於「民眾思想」這個處於學界之外、然而卻是「輿論」的重要一極的關注明顯不足，似乎只是在全書最後的「尾章」中點到為止。事實上，在戰後日本，對社會世相、民眾思想的研究蔚然成風，研究的理論、方法和有價值的成果也頗多。尤其是進入60年代以後，經濟的高速成長使日本進入富裕社會，一般民眾的生活水準大大提高，乃至有「一億中流」的說法，意思是所有國民都成為了「中產階級」。「中流意識」的普遍化及日本社會特有的社會分層的不明顯，使得以往的理論難以對日本的社會現實做出合理的解釋，從而，日本社會的「輿論」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又反過來影響了日本學界的理論和研究方法。

正如從文化學和文化社會學的角度出發，市井小民在「文化」中佔據的位置可以和文化泰斗不相上下一樣，在日本這樣的現代民主國家，普通民眾影響輿論的成分一點都不少，甚至可能更多。否則，就難以理解日本社會所特有的「右翼」、「保守」、「改憲」等社會現象的成因。同樣的，包括今天在島國正被熱炒不已的否定侵略歷史的「自由史觀」、旨在使日本過渡為政治、軍事大國的「普通國家」論，以及「中國威脅論」在內的所有「輿論」，也絕對少不了日本普通民眾的參與（絕對不是甚麼「一小撮」）。